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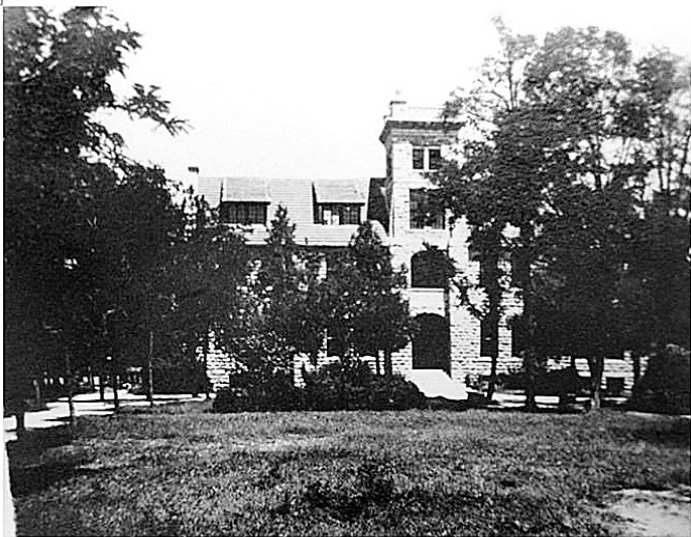
□历史回眸

# “北大洋楼”百年记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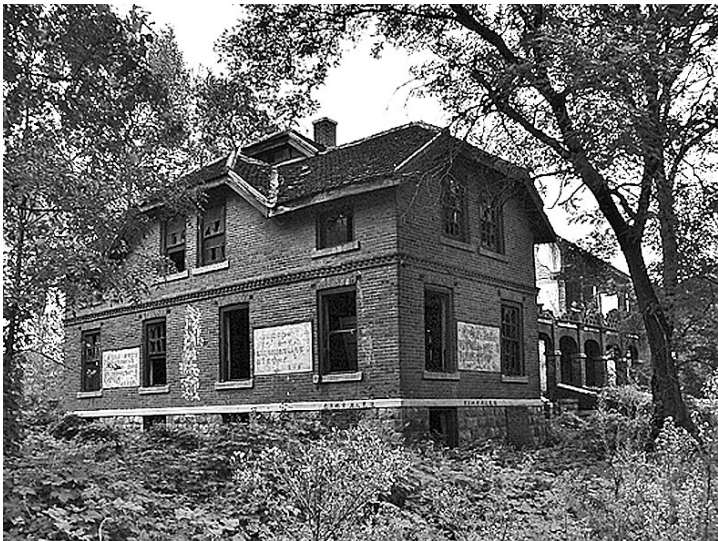
□马西良



北坛医院内华北医院仅存的洋楼



华北弘道院教学楼外景



昔日华北神学院教师办公住宿的西式洋楼



当年华北神学院的毕业证

麻风病人筹款时再次收到日本人发出的劝募警告。她返回滕州后,将她从教会筹到的钱换成硬通货币——银元,转交给当地的几位绅士,嘱托他们用这笔钱照顾好院里的病人。

麻风病人知道她要走了,大伙忙活了一夜为她赶做的衣服。那件衣服是用很多布条缝制的,每一个布条上,都写着一位麻风病人的中国名字。她在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悲伤的时候穿上那件奇特的百衲衣,留下了她在中国土地上32年的最后一张照片。她走后,滕州绅士黄以元等人用她留下的银元买下麻风村附近的一大片土地,土地租给附近农民租种,每年收上来的租子用来维持麻风病人的治疗和饮食开支。解放后麻风医院由政府接管,先后更名为“山东省第九康复医院”、“山东省第三康复医院”、“山

所以任何一个位置均可以看到讲台。上面左中右均有小楼,礼堂内可坐150人,楼上可坐100人。左面是一座两层楼的建筑物,楼上是图书馆,楼下是一间能坐150人的大礼堂,每逢赫士博士授课时全体四级的同学均去听课。右面也是一座两层楼的建筑物,分为四间课堂,每一间可容纳一百五十人,大礼堂的地下室是厨房及饭堂。整座大楼既宏伟壮观又经济适用,凝聚着赫士匠心独运的大智慧。

华北神学院从1919年9月创办,到1952年11月合并到金陵协和神学院,在33年的办学历程中共培养了大约一千名毕业生,在香港、韩国、台湾、南洋爪哇等地区 and 内地主要城市建立起校友组23个。

1881年出生在美国伊利诺斯州的修女护士道德贞,1918年左右从大洋彼岸的教会筹得善款来到中国,最后定居在山东滕县。在此期间,她办起了女孤贫院,免费招收贫困女孤儿入学。又从美国的教会组织筹得善款,建起了鲁南、苏北地区第一所基督教会麻风病医院——滕县基督教会医院,据说,此院是山东当时规模最大患者最多的麻风病医院。

道德贞亲自把流落荒野的麻风病人接回自己创办的医院,亲自给他们擦拭伤口。她不戴口罩,也不戴手套,她和他(她)们亲如兄妹、姐妹。好景不长,日本人发动侵华战争初期,作为中立国——美国公民,道德贞多次被占领滕州的日军告知“非常时期,不能保证她的人身安全”,令其离境。

1939年左右,道德贞到南京为

20世纪初叶,几名外国友人带着崇高的理想和对信仰的崇拜,不远万里来到一座小城,在贫瘠落后的小县城,先后建起了华北基督教堂老会、华北神学院、华北弘道学院、华北医院、华北孤儿院,传播科学文化和西方文明,一时使名不见经传的的小城,成为这一地区的最高学府,国内外知名的教育圣地。这一时期,该城市的大街小巷漫步着来自全国各地和东南亚、朝鲜的留学生。百年过去了,经过历史的尘埃和战争的洗礼,当年一度辉煌的华北“五北”,只留下了一段段残垣断壁和几座西洋小楼,书写着逝去的辉煌历史。

洋务运动的兴起,打破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壁垒,西方一些先进的理念和开放的思想纷纷涌来。1901年来华的牧师罗密阁从潍县乐道院来到滕县传教,先是买了数间瓦房作为布道所,后又买了一所宅院,开办福音堂,进行传教活动。1913年,罗在北关外,购置大片土地盖了宿舍楼(今尚存的滕州一中南院教师宿舍院内石墙的二层楼房),这时美籍牧师申乐道,道德贞(女)相继来滕,又盖了能容千余人的礼拜堂(草屋顶);随后,又筹资建起了崇桢女子学校(原名崇道堂)、女孤贫院、麻风病医院。

华北弘道院,是美北长老会传教士狄乐播为纪念其兄狄考文而设立的,所以又曾叫“考文中学”或“狄考文学院”。狄考文是美国宾夕法尼亚人,1863年年底来华传道,1908年在青岛去世,葬于烟台,实践了他把一生奉献给中国——住在中国、死在中国、葬在中国的誓言。狄考文的弟弟狄乐播此前受兄长感召亦来中国传教,并在兄长去世后用狄考文身后遗款购地在滕县创办新民学校。新民学校的学制、课程设置与普通中学相似,这就是华北弘道院的前身。

1901年,慈禧太后下诏变法,颁谕各省兴办大学。应山东巡抚袁世凯之请,美国著名教育家、传教士赫士前往济南,在一个月之内就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省立大学——山东高等学堂。他还协助袁世凯创办邮政、报纸等新兴行业,开始在学校推行礼拜天休息的制度。赫士先后获得了天文、法学、汉学、神学四个博士学位,清廷因他功劳卓著赐他为进士。赫士博士精通汉语,光绪年间曾著《天文初阶》等多部科学史学著作,所著书纯用文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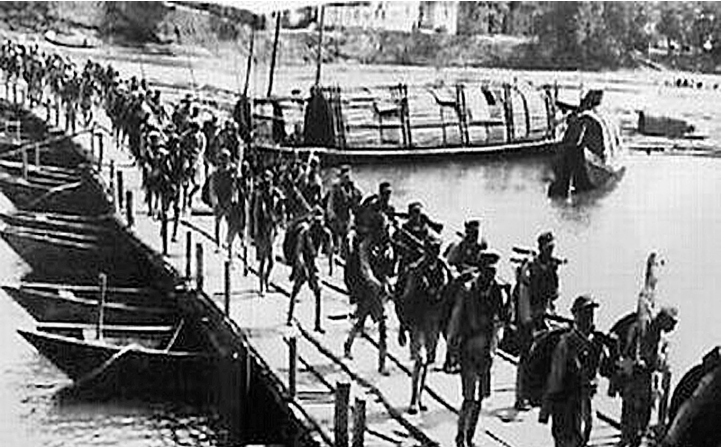
1904年—1919年赫士任齐鲁大学神学院教授。1922年赫士将其在山东潍县创办的华北神学院迁至滕县,与弘道院共用一处校园。华北神学院在赫士的悉心经营下成为北方最有影响的保守派神学院。他不仅教学传授先进的科技文化,天文历史等知识,还译有24种科学书籍。

华北神学院和华北弘道院的学制、课程设置与一般大学无异。两所学校的教师互有兼课,学生也可以相互听课。不少学生在弘道院毕业以后,升入华北神学院或齐鲁大学继续学习。华北神学院的到来显然让弘道院获益匪浅,自然也开滕县风气之先,最高时在校学生多达200余人,女生占三分之一,可谓盛极一时。起初占地仅80余亩。后来与神学院合在一起,扩大到300余亩,有教堂、钟楼、藏书楼和作为教职员工住宅的6座西式洋楼等,20多栋建筑连綿一片。据说,每当上课和礼拜的时候,钟声袅袅,声播十里,时人艳羡地称之为“北大洋楼”。

校内建筑有教学大楼、藏书楼、礼拜堂、教授楼13座,校园内全园林化,学生宿舍皆为平房五大排,朝南背河环境极幽美。弘道院初为四年制,理论偏在道学。学生毕业后可直接深造济南齐鲁大学与北京华北工学院。华北弘道院与神学院,在一座校园内,两院教师有的双方兼聘,故弘道学生可去神学院听自然科学与文学、哲学,神学院学生亦可来弘道补习英文与语文等。

华北神学院的宗旨在于为中国基层教会培养领袖,其生源遍布中国十多个省份,乃至朝鲜与南洋。1927年,华北神学院的学生数达到186人,成为中国学生人数最多的一个新教神学院。院长赫士还经常聘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来院讲演,开展学术交流活动。1934年9月请美国巴尔好施博士来院讲道,1935年4月请美国耶鲁大学神科科长韦格爾博士讲演宗教教育。

赫士从美国请了一位工程师,经过精心设计完成了神学院的主体建筑:前面是三间大建筑物,中间是一间礼拜堂,是戏院式的设计,



伯父随二野在进军西南途中

□记忆

## 伯父张冠伍南下记

□张健

淮海战役结束,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《将革命进行到底》的新年献辞,向中外宣告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下,解放全中国。在这一历史背景下,遵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,华东局选调大批干部随军南下,接管新区政权。我的伯父张冠伍(曾用名张立峰,1914年12月生于枣庄市薛城区沙沟镇黎墟村,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)时任鲁南军属管理委员会生产委员兼滕县支前大队教导员,上级组织已决定选派他南下。

当年2月1日,在临城县(今薛城)天主教堂召开负责组织1套区党委(省级)、10套地委、400套县(区)委领导班子负责人会议,听取鲁中南区党委领导傅秋涛作“淮海战役胜利成果和当前任务”的报告,传达了中央及华东局会议精神,高克亭宣读了“南下干部守则”。对负责接收浙江、福建、上海、西南等新解放区的4000名干部分期培训,之后分批南下。

6月2日,中央军委电令:“二野入川应积极准备,情况许可下争取八月初出动,小平准备去四川。”在研究这支南下干部队伍名称时,邓小平强调:“叫服务团,更能体现和符合为西南人民服务的宗旨。”伯父是第7批(山东最后一批)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“西南服务团”奔赴四川的,也是鲁中南区选拔的地委级干部6中的一员。

据伯父说,山东分局选拔340名老干部和西南籍干部10人,组成南下干部队,周贤任大队长、孙振华任政委,于1949年7月24日,从济南(党校)启程南下,行军中解放了安徽凤阳城,到南京时共有1.7万名西南服务团成员,他们大部分都是来自上海、苏南、皖南、赣东北的学生或青年积极分子。来宁集结后,大家在中央大学广场上听取邓小平讲《论忠诚与老实》的报告。南下人员为便于统一行动,实行军队编制并随时待命。在徐州学习时,我的一位表大爷张泽民,两位表叔张泽全、刘圣德,就是在参加淮海战役后,没有回老家峰县四区张庄村和临城八区黎墟村,而是跟随伯父南下,后分别接管浦口、六安、厦门的新区政权。

10月上旬,伯父等人在下关火车站乘敞篷车经徐州、郑州到汉口,后步行南下。10月21日,伯父在湖南常德出席宋任穷(总团长)主持召开的“关于接收川、贵工作的重要会议”,会上邓小平政委讲,山东及其周边数万名干部坚决服从党的指挥,搬家舍业,别妻离子,远离挚爱的家乡水土和熟悉的工作岗位,跟随着挥师南下的二野,踏上接管新解放区的革命征途。可以说,没有你们的不畏困难,无惧牺牲,就没有新区的建立和巩固,就没有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。会后第一团川东支队(伯父时任支队长)编入第五梯队与第三兵团司令部一同行动。11月6日,他们抵达茶洞,敌人焚毁洪茶大桥,部队架设浮桥渡清水江,攻胜洪安,随之秀山县城解放。

入川后,伯父是第一批接管重庆工作的干部,任川东剿匪工委副主任兼巴县(今重庆市巴南区)县委书记。据伯父回忆,整个接管工作不到两个月的时间,在当时的形势和条件下,速度快、效率高,堪称奇迹。西南服务团成员接管工作约占整体工作的百分之九十,居功至伟。在1950年1月23日伯父参加的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,首任市长陈锡联,对山东籍南下干部群体给予了隆重表彰。

1987年国庆节,我赴渝省亲。伯父给我讲:“从1949年12月到1950年3月,仅在剿匪、征粮等斗争中,就有68名西南服务团的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,其中有咱山东老乡17人。永川县公安局侦察股长张汝德(新泰人),1950年1月31日在剿匪战斗中壮烈牺牲,时年29岁,山东省人民政府1951年5月6日批准该同志为革命烈士;1950年2月17日,西南服务团邮电中队刘政文(昌乐人),押送由巴县到省城(成都)的邮件,至大足途中,遭匪袭击,毙敌两名后,因子弹打光,寡不敌众,壮烈牺牲,年仅19岁。”伯父当时参加了两位烈士的追悼会,评价他们不愧是山东革命老区的好后代,为南下干部争了光。

作为新区政权的巩固者,参加南下西南服务团的齐鲁儿女和众多革命者一道,行程8000里,其中步行4200里,齐心协力,排除万难,不怕牺牲,为解放和建设西南贡献了青春年华,无论在党史、军史上,还是在解放西南斗争史上都书写了光辉的篇章,并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

1962年国庆节祖父母从山东去重庆和伯父(后排中)家人合影